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逻辑与现实挑战研究

陈劲康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2023年9月, 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宣布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从成立逻辑看, 其形成是多重结构性压力叠加的产物: 既有区域治理框架的系统性失灵造就了制度性空缺, 共同的政治安全危机催生了防御性整合冲动, 后殖民结构的经济依附困境则提供了深层的历史动能。同时, 联盟的运行整体上面临两层现实挑战: 在经济层面, 成员国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极度匮乏, 制约联盟机制的有效运转; 在对外依赖层面, 联盟以反依赖为旗帜, 实则陷入依赖对象转移的结构性困境, 战略自主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深层矛盾。

关键词: 萨赫勒国家联盟; 成立逻辑; 现实挑战

DOI: 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3016

0 引言

萨赫勒地区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 是非洲大陆生态脆弱性与政治不稳定性高度叠合的地带。近几十年来, 该地区气候变化加速、极端主义扩张、跨国犯罪蔓延与国家能力持续弱化, 共同构成了一幅复合危机图景。在此背景下, 传统区域治理机制屡屡失效, 国际社会的外部介入也未能扭转安全颓势, 萨赫勒地区的治理困境逐渐演变为全球发展议程上的重大议题。

2020年至2023年间, 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接连发生多次军事政变, 政治格局急剧重组。面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的经济制裁与军事干预威胁, 三国选择走向联合自保。2023年9月, 三国正式缔结《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 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des États du Sahel, AES); 2024年7月进一步升级为邦联, 总部设于马里首都巴马科, 标志着一个新型区域行为体的正式登场。

这一新兴组织的崛起, 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与现实压力的双重塑造下生成的, 其背后有着清晰的成立逻辑, 而非单纯的政治权宜之计。与此同时, 联盟自成立以来, 在经济基础与对外依赖等层面均面临深刻的现实挑战, 对其发展产生极大的制约。本文旨在从结构与能动的双重维度, 系统解析联盟的成立逻辑, 并对上述挑战加以深入剖析, 以期理解当前西非地区秩序转型提供学术参照。

1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逻辑

1.1 既有治理框架的系统性失灵: 制度性空缺的生成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诞生, 首先根植于既有

区域治理框架无力回应三国核心关切这一结构性前提。以西共体为代表的制度安排, 在应对萨赫勒独特安全与发展需求方面存在难以弥补的结构性缺陷。西共体的决策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大国主导格局, 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沿海经济体凭借更大的经济体量掌握核心话语权, 而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内陆小国在重大决策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其诉求难以有效进入议程。更关键的是, 西共体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叙事建立在民主规范的维护上, 将任何通过非选举途径取得政权的行为定性为对组织宪章的根本违背, 由此引发针对政变国家的制裁机制。然而, 这套规范框架对于成员国内部因长期贫困与安全失效累积的结构性危机却缺乏有效的回应, 使其政策干预的正当性遭到被制裁国家的强烈质疑。

针对西共体安全功能不足而设立的萨赫勒五国集团(G5 Sahel), 同样暴露出外部驱动型安全合作模式的内在局限。该框架运作经费的相当大比例来自法国与欧盟, 行动优先议程日益偏向外部捐助方利益, 与成员国期望的自主安全定位形成落差。2022年马里政变后, 该机制遭到内部孤立, 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相继退出, 机制于2023年底名存实亡。两大既有框架的相继失效, 在萨赫勒地区制造了治理真空, 客观上为新型自主区域组织的诞生提供了结构性空间。

1.2 共同的政治安全危机: 防御性整合的现实驱动

如果说既有框架的失灵提供了联盟成立的结构性空间, 那么2023年的政治安全危机则是将潜在联合转化为现实行动的直接催化剂。2023年7月尼日尔政变后, 西共体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宣布对尼日尔实施全面经济

封锁，威胁进行军事干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当即发出联合警告，明确表示将任何针对尼日尔的军事行动视为对本国的宣战。这一集体表态背后，是三国共同的生存危机感。

萨赫勒地区的安全态势同样构成促成联盟的重要现实驱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等武装势力以三国交界地区为活动核心，频繁实施跨境暴力袭击。据统计，2024年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死亡人数约占全球同期总量的51%，三国合计死亡人数约3036人，占地区总数近八成。现有安全治理机制面对如此烈度的跨国恐怖威胁明显力不从心，而单一国家的军事资源又难以独立应对跨境武装威胁，构建多国协同的集体防御机制由此成为三国的共同战略选择。2023年9月签署的《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集中体现了这一防御性整合逻辑：宪章第六条确立了集体防御原则，明确规定针对任一缔约方的武装侵略即视为对全体成员的侵略；第八条则进一步禁止成员国之间相互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功能，在于将个别成员国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转化为联盟层面的集体回应，从而实现防御能力的整体跃升。

1.3 后殖民结构的经济依附困境：深层历史动能的释放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还有一条更为深沉的历史线索，即三国在后殖民框架下长期延续的经济依附结构及其对集体突围的深层渴望。三国在实现政治独立数十年后，经济上始终未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去殖民化转型。以法国公司为主的外资企业主导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初级出口，加工增值环节留存于域外，资源财富的本地留存率极低；三国国内产业链条薄弱，就业创造与技术积累均严重不足。在货币制度层面，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体系长期束缚着三国的货币政策自主空间，外汇储备的相当比例被制度性地输送至法国央行，使三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缺乏基本工具。

这一结构性依附在三国军政府上台后遭遇前所未有的制裁冲击，其脆弱性以极端方式得到显现：西共体制裁期间，边境封锁与金融交易暂停几乎即时切断了三国的贸易命脉，外部援助中止更使财政体系濒临崩溃，充分揭示了高度对外依赖模式的政治风险。这种依附困境的集中爆发，不仅强化了三国军政府脱离既有框架的政治意志，更赋予联盟的经济整合议程以更为迫切的现实感。

2 萨赫勒国家联盟面临的现实挑战

2.1 经济层面：薄弱基础对机制运行的根本制约

经济基础的极度薄弱，是制约萨赫勒国家联盟各类机制有效运行的根本性物质障碍。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显示，三国人均GDP均处于全球末位区间：尼日尔约643美元（全球倒数第6位）、马里约867美元（倒数第15位）、布基纳法索约883美元（倒数第14位），三国均长期位列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公共财政资源严重匮乏。从产业结构看，三国经济高度单一化。农业吸纳了六成以上的就业人口，但因技术水平低下与生产投入不足，粮食自给率持续偏低，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依赖长期存在。矿产资源虽较为丰富，却以外资主导的初级原料出口为主要形态，本地深加工产业链极为薄弱，对技术积累和就业创造的实质贡献十分有限。这种结构性短板使三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外部政策冲击极度敏感，内生稳健性严重不足。

经济脆弱性对联盟核心机制的制约呈现出多维度叠加态势。在金融机制层面，2025年5月宣布启动的联盟投资开发银行计划初期注资5000亿非洲法郎，但三国财政收入有限，国际制裁又阻断了主要外部融资渠道；银行独立运营所必需的金融监管体系与市场信用基础，在三国均付诸阙如，短期内该机构更可能以政治宣示功能为主，而非承担实质性区域发展融资职能。在安全机制层面，联合部队约5000人的规模对于应对三国数千公里边境线的安全威胁而言本已捉襟见肘，联合军演的常态化运作与反恐情报平台的技术建设均需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而三国有限的国防预算已难以同时兼顾国内安全支出与联盟层面的集体军事合作。

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脆弱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于一个相互强化的多元困境之中：持续的安全威胁压缩了经济正常运转的社会环境，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反过来削减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国防与安全开支的刚性增长又进一步挤压了教育、卫生与基础设施等非安全类公共投入。与此同时，系统性腐败所造成的公共资金持续流失，进一步削弱了三国向联盟机制注资的财政空间。上述因素交织叠加，形成了经济脆弱、安全恶化、财政萎缩、机制失能的封闭式恶性循环，从物质层面构成联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2.2 对外依赖层面：战略自主目标与结构性依附的深层矛盾

萨赫勒国家联盟将摆脱外部依赖、实现战

略自主列为核心政治目标,然而,联盟成员国在贸易、军事安全与战略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结构性依赖,构成了这一目标与现实之间难以逾越的深层鸿沟。在经济贸易领域,三国退出西共体虽在制度形式上斩断了与原有体系的纽带,但并未消除对外部市场的实质依赖。三国内部贸易在各国贸易总量中占比偏低,区域生产要素的互补效应尚未有效激活;计划中的区域内市场受制于安全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缺口巨大和行政能力参差,推进迟缓。贸易伙伴的更换并不必然带来依赖程度的降低,转向俄罗斯等新伙伴同样面临地理距离、标准对接与市场容量的现实约束,外部经济依赖的结构性根源依然存在。

在军事安全领域,法国军队被驱逐后,俄罗斯非洲军团(前身为瓦格纳集团)随即填补了安全真空。俄方向三国提供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及轻武器等装备,并派遣军事顾问参与反恐特种部队训练。2024年非洲军团先后进驻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甚至占据了美军撤离后的101空军基地。这一转换的本质,是将原有的对法军事依赖置换为对俄军事依赖,联盟在安全保障上对外部大国的结构性倚赖并未改变。更为复杂的是,俄方军事介入深度与三国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的拓展高度捆绑,安全合作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资源利益的让渡,进一步压缩了联盟经济自主的实质空间。在战略技术领域,联盟对外依赖的延伸更为显著。2024年俄罗斯与布基纳法索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路线图,拟建核电站;尼日尔与俄罗斯Glavkosmos签订卫星采购备忘录,涉及通信与安全监控卫星系统。这些合作固然在短期内填补了联盟在能源与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缺口,但核能供给与卫星系统的运维高度依赖单一技术供给方,一旦外部关系出现变数,将形成新的战略脆弱点。

参考文献:

- [1] 孙红. 西非三国要组建联邦制国家? [J]. 世界知识, 2024(2): 54-55.
- [2] 张巍、秦淑娟. 萨赫勒国家联盟雏形已现 [J]. 世界知识, 2025(8): 54-55.
- [3] 张春、杨琦. 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困境探源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4(1): 87-111.
- [4] 齐建华. 非洲法郎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 [J]. 中国投资, 2021(Z0): 82-84.

作者简介: 陈劲康(2000.09—),男,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从整体格局审视,联盟面临的对外依赖困境还有更深一层的逻辑:正是由于联盟与西共体及西方国家关系的持续紧张,联盟在联合国、非盟等多边舞台上的话语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争取国际援助与多边合作的渠道高度收窄,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单一替代伙伴。这种孤立处境与单一依赖之间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循环:外交孤立加深单一依赖,单一依赖又弱化了多元布局的能力,使联盟愈发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大国在萨赫勒地区的竞争性介入,使联盟机制面临被工具化的风险,偏离其自主发展的初衷。

3 结论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是既有区域治理框架系统性失灵、共同政治安全危机触发防御性整合冲动与后殖民经济依附困境积累的深层历史动能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同时,联盟的长期可行性面临两层现实挑战的制约。在经济层面,三国极度薄弱的财政基础与单一化的产业结构,构成联盟各类机制有效运转的根本物质障碍;经济脆弱性与安全恶化、治理失效之间的相互强化,形成了难以依靠局部努力突破的结构性困境。在对外依赖层面,联盟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以替代性依赖取代原有依赖的循环,战略自主的政治宣示与结构性依附的现实之间存在深层矛盾,且随着对单一外部伙伴依赖程度的加深而愈加突出。深入认识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逻辑与现实挑战,对于我国精准研判西非地区格局演变、妥善处理与联盟三国的外交关系具有重要参照价值。我国应在尊重三国自主发展选择的基础上,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稳步推进经济、安全与人道主义领域的务实合作,审慎评估大国博弈风险,在萨赫勒地区的秩序重塑进程中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